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发表的历史背景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主席在社会主义时期发表的一篇重要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輝著作。它深刻地总结了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經驗，全面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問題，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說，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繼續革命的伟大理論。从理論上解决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最重大的課題，繼承、捍卫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奠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綫的理論基础。它象光芒万丈的灯塔，照耀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航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我們学习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來說，它是前一阶段的斗争的总结，又是后来一系列斗争的指导思想，是学习整个过渡时期党史的基本必讀文件，是我們学习的总綱。在当前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的时候，認真学习毛主席这一伟大著作，对于学懂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論，搞清楚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問題，也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很好地理解毛主席这一著作的基本思想和伟大意义，首先要弄清楚它发表的历史背景。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會議上的講話。同年六月十九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紧要关头，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新的重大考驗的关键时刻，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需要給以馬克思主义的回答。

在国际上，一九五六年由于赫魯晓夫叛徒集团的反革命叛卖活动，造成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大泛滥，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在列宁的领导下，首先取得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繼承了列宁的事业，巩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取得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伟大胜利，粉碎了德国法西斯的进攻，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推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发展。特别是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形成了欧亚大陆連成一片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陣营，形势一派大好。但就在这种形势下，在列宁主义的故乡，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現了赫魯晓夫修正主义的公开出籠，形成了国际阶级斗争的严重、复杂局面，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重大的考驗。

赫魯晓夫是长期隱藏在苏共党內的資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他怀着强烈的个人野心，于一九一八年混入党內，并以反革命两面手段一步一步地鑽进党的领导核心。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逝世不久，他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他以卑劣的手法，打击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和苏共的老布尔什維克，于一九五三年九月，窃取了苏共党的第一書記职务。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他又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抛出了一个恶毒攻击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借口所謂“反对个人迷信”，大反斯

大林，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丑化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根本否定斯大林所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公开背叛。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打击忠于马克思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给被无产阶级专政镇压的牛鬼蛇神翻案，极力拼凑他的反革命黑班底。这是他进一步篡党夺权的重要步骤。同时，在这次大会的总结报告中，他又借口世界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公开抛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修正主义路线。他胡说“和平共处”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胡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有可能“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从而使议会“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造成“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也就是说，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实质上是公开“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纲领，是赫鲁晓夫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到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就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之外，又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谬论，胡说由于苏联“剥削阶级被消灭，镇压他们反抗的职能也就消亡了”，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是不必要的了”，社会主义国家“已变为全民的国家”，它的职能就是“组织经济和文化教育”。还说什么由于“苏联消灭了阶级”，“社会主义完全地和最终地胜利了，形成并巩固了苏维埃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因此共产党“现在成了全体苏联人民的党”。这样就形成了一条系统的“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加速在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使第一个社会

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一个历史的大倒退。

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不仅在苏联大反斯大林，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而且利用苏共在历史上形成的威望，利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和经济、军事力量，发号施令，横蛮地干涉他党他国的事务，强制地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打击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按照他们的意愿撤换其他党的领导，扶植和起用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利用种种压力把东欧和蒙古拉入他们的修正主义轨道，加速了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把蓬勃发展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拉向后退。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径，给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分子提供了反共反人民的最有利的武器。美帝国主义欣喜若狂，把这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他们“目的”的举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情不自禁地说：“昨晚闭幕的苏联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修改了苏联共产党的信条”，

“我是有理由感到高兴的”。他们叫嚣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促进“苏联内部发生基本的变化”。

苏共二十大闭幕不久，美国报纸就公开发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接着，一切反共分子都纷纷出动，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浪潮。他们集中攻击斯大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许多人迷失了方向，分不清是非，丧失了信心，大批的党员和同路人离去，有些党的党员人数减少了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一些叛徒、投机分子则同帝国主义、各国

反动派一起向馬克思主义、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社会主义国家猖狂进攻。在这个过程中，东欧各国也发生了极大的动荡和混乱，波、匈事件就是突出的例子。

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波蘭的所謂“克服个人崇拜”的后果、和所謂“民主化”的过程中，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利用某些企业中的經濟困难和工人中的某些不滿情緒，在羣众中进行挑拨和煽动，制造了反对人民政权的騷动、罢工和流血事件，袭击了波茲南市的党政軍机关，冲进了監獄，释放了罪犯，进攻了公安局，发生了武装冲突。在这个事件之后，七月，修正主义分子哥穆尔卡就恢复了名誉，十月，就上台当了党中央第一書記。接着，他就积极推行修正主义路綫，在政治上实行大清洗，大批撤換干部，在經濟上大搞“經濟改革”，“企业自治”。在农村則否定农业合作化的路綫，一年之內就解散了占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农业社（八千个），允許土地自由买卖和雇工。在思想上大搞資产階級自由化，宣揚資产階級生活方式，縱容宗教活动，使資本主义在波蘭复辟。

在匈牙利，一九五六年十月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在帝国主义和国际修正主义的阴謀策划下，在苏共二十大的恶劣影响下，由匈牙利一些反动的“文化人”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以举办科学討論会为名，大造反革命輿論，攻击党的領導，攻击无产階級专政，宣揚資产階級的民主、自由，鼓吹資本主义制度。这些内外反动派互相呼应，利用人民内部矛盾，挑拨离間，兴风作浪。十月二十三日，在反革命的煽动下举行了羣众游行。成羣的特务、間諜和前法西斯分子涌进羣众游行队伍，喊出了“赶走共产党人”、“由納吉主持政府”，把游行变成了反革命暴乱。次日，修正主义分子納吉就篡夺了領導权上台执政。他一上台就故意使人民武装力量陷于瘫痪，并

把二万多件武器交給反革命分子。他还宣布匈牙利“中立”，并要求由联合国和苏美英法四国保証其中立。在納吉的縱容下，牛鬼蛇神紛紛出籠，向工人貧下中农反攻倒算，資本家要“收回”工厂，地主要农民“归还”土地，外国垄断公司的老板也跑到布达佩斯要“收回”他們的企业。反革命分子在前霍尔蒂軍官的帶領下，袭击党的机关，农业生产合作社，拖拉機站等，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仅布达佩斯在十天之中，就被杀害二百多人，監禁三千人。十天的暴乱，給匈牙利造成了极大的損失，仅經濟損失就等于全国职工两年的收入，商品儲存量几乎減少了一半。匈牙利事件，实际上是在修正主义的配合下，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反革命武装复辟的一次演习，使匈牙利几乎丧失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极端反共的杜勒斯兴高采烈地狂叫：“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質，在現在看来似乎是可能的事情。”

一九五六年国际上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向每一个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个重大的任务，这就是：一方面要回答帝、修、反对斯大林、对无产阶级专政、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誣蔑，打退他們的猖狂进攻；另一方面，也要科学地分析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各种問題，从中吸取經驗教訓，例如：如何正确地評價和对待斯大林？为何正确地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苏联的基本經驗是什么？十月革命道路还有沒有普遍意义？又如，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出現修正主义上台？社会主义的匈牙利为什么会发生反革命复辟？怎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国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資本主义复辟？等等。只有正确地回答了这些問題，才能粉碎帝、修、反的攻击和誣蔑。

为了正确地回答这些問題，我們党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了深入的討論。一九五六年四月和十二月，《人民日报》編輯部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討論，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和《再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两篇重要文章。两文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历史地、全面地总结了苏联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分析了斯大林的功过及其錯誤产生的原因。文章充分地肯定和贊揚了斯大林的功績，指出他是一个伟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虽然斯大林也犯有一些严重錯誤，但同他的伟大功績相比，是第二位的，不能全盘否定。他的錯誤虽然和他的主观原因分不开，但是也有客观的原因，带有历史的特点。文章指出，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証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錯誤。从苏联将近四十年发展証明：苏联的經濟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經濟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錯誤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糾正这些錯誤，当然不需要去“糾正”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間，在上层建筑和經濟基础之間，也仍然存在一定的矛盾，存在某些环节上的缺陷，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調整。文章还強調指出在我們面前有两类性質不同的矛盾，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决不应把两类矛盾等量齐观，或互相混淆，更不应把人民内部矛盾置于敌我矛盾之上。文章的这些分析，是对帝、修、反的反革命叫囂的有力回答，也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的深刻总结。但是，由于当时的形势，这两篇文章的内容，不能不更多的偏重于論战的性質。随后，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就着重从正面进一步闡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階級和階級斗争問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从理論上作了馬克思主义的

回答。所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国际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产物。

从国内来看，当时我国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迅速地改变着我国的面貌。特别是一九五六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是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一场深刻革命，使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时，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建立，但是还不巩固和完善；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一方面，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已经进一步加强，但是在我們面前，还存在两类社会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内政治生活中的重大现象；一方面，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又酝酿着新的重大的斗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下面就各个阶级的动态作些简单的分析。

民族资产阶级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他们在企业里具有两重身份，一方面是国家工作人员，与工人阶级是一种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合作共事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拿定息，还有剥削，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还是一种阶级剥削关系，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资产阶级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在企业劳动的过程中，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和改造，使自己从剥削者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这个时候，资产阶级虽然不得不被迫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然而在思想深处，对资本主义仍然是恋恋不舍，对社会主义则是格格不入。他们的立场、思想感情、生活习惯等等，都还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虽然

他們的絕大多數還是愛國的，願意為社會主義的祖國服務，因此也是可以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當然這必須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和很複雜的改造和反改造的鬥爭過程）。但是資產階級中也有一部分人是敵視和反對社會主義的。雖然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由於當時的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他們沒有敢於豎起反抗的旗幟，但他們是不甘心亡國共產的。他們有的人說：

“合營之前小國之君，合營之後大國之臣，合併之後亡國之民”，就是他們這種心理的寫照。一九五七年一月，在上海市二屆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上，一個資產階級代表提出了要“定息二十年，一次贖清”的所謂建議，其實就是要恢復他們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已經被取消了的資產階級法權。他們還特別想從政治上、思想上與工人階級較量。此時有些人極力散布資產階級已經沒有兩面性、只有一面性的謬論，說他們和工人階級已經沒有本質的區別了，已經沒有階級關係，沒有階級鬥爭了，也不需要繼續改造了。有的甚至說什麼中國資產階級是“紅色的”資產階級，是帶着財產進入社會主義的，比工人階級對社會主義更有貢獻。大有要由資產階級來領導工人階級的架勢。還有的人則用種種手段破壞社會主義經濟，搞地下工廠，合公營私，貪污盜竊，投機倒把，挑撥離間，打擊工人和公方代表，拉攏腐蝕幹部和工人，極力篡奪企業的領導權。正象毛主席在第八節里講的：“**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後，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鬥爭，包括思想方面的鬥爭**”。所以，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還是嚴重存在的，鬥爭還是長期的。

與資產階級有密切聯繫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時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於所有制方面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原

来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已經失去了他們依附的經濟基础，知识分子的改造不仅很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就知识分子的絕大多数來說，他們是愛國的，是贊成社会主义，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愿意改造和能够改造的，其中有許多人还認真学习馬克思主义，有的已經成为共产主义者。但他們大多数人的世界观，仍然是資產階級的，对社会主义还很生疏、不习惯，旧的一套还是根深蒂固，例如單純业务观点、知识私有、輕視劳动和劳动人民、自高自大，同工农羣众缺乏共同的語言、习惯于走老路，对新生事物看不慣，等等，一遇风浪，他們就左右搖摆，動搖不定。所以他們成了右派分子爭夺的对象。还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他們“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頑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他們极力要爭取中間派跟他們走。因为資產階級知识分子在上层建筑的許多部門还很有力量，甚至占居統治地位，他們想和无产阶级爭夺这些思想文化陣地的領導权，妄图为其顛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資本主义制造輿論，并培养他們自己的接班人。这些人在政治上是很敏感的。毛主席发出“百花齐放，百家爭鸣”的号召以后，他們就蠢蠢欲动。匈牙利事件又給他們以很大的鼓舞。他們不甘寂寞，四出活动，煽风点火，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攻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要同无产阶级較量一番。从当时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和《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結》等文章里，可以看到这样的动向。

作为資產階級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代表的民主党派，其中一些右派領導人的动向，可以說正是反映了上述資產階級右派

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右派的要求。這些人在毛主席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以後，也是野心勃勃，跃跃欲试。他們對於國際修正主義的泛濫和匈牙利事件十分嚮往，盼望在中國也來一個匈牙利事件。為此目的，在五六年冬五七年初一些民主黨派的會議上，這些人大事活動，提出了要大大發展民主黨派的組織。章伯鈞提出民主同盟要發展到一、二百萬。一九五七年內就要由三萬人發展到五十萬。他們要求打破對民主黨派發展組織的限制，要求到青年甚至工农中間發展組織。其目的就是為他們同無產階級較量作組織準備。他們上下串連，推波作浪，妄圖煽動工农和學生鬧事，以便造成天下大亂，他們好趁機奪權。因此，一場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新的搏鬥是不可避免的。

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由於合作化的基本完成，個體所有變成了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個體的生產和分配變成了集體的生產和分配。這是千百年來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習慣的一個極大變化。絕大多數的貧下中農和手工業者是積極擁護合作社的。但是小生產者長期個體經營的傳統、個人私有的心理、和個人發家致富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是十分頑固的，是和社會主義相抵觸的。特別是少數富裕農民，這種傾向是嚴重的。加上絕大多數合作社都成立不久，如何領導和管理集體的生產和生活，如何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這三者的關係，如何處理積累和消費、集中和分散的關係，如何貫徹民主辦社、勤儉辦社等原則等等，都是新問題，還缺乏經驗。同時一九五六年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雖然大多數社隊增產了，大多數社隊增加了收入，但是少數社隊和少數社員沒有增產和增加收入，或甚至減產和減少了收入。所以有些人就對合作社的優越性表示懷疑和動搖，就刮起了一股合作社沒有優越性的小台風。少數人還

带头鬧粮食，鬧退社，极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上阶级敌人的煽动和破坏，所以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是严重的，长期的。教育农民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一般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却是大量的、普遍的存在，必须正确地加以解决。

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坚定地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建国七年来，工人阶级的队伍由七百万增加到二千万，大量非无产者加入到工人阶级的队伍中来，必然要带来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上由于社会大变动也引起经济上的某些暂时不协调，物质供应上的某些暂时困难等等，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甚至发生少数罢工事件，这就形成了人民和政府之间、领导和群众之间、群众和群众之间的种种矛盾，也必须加以正确地解决。

社会大变动在党和政府的干部队伍中也引起许多新问题。例如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组织广大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还缺乏经验，需要不断地总结和探索。其次是对三大改造高潮后的基本形势还缺乏正确的认识，一方面有些人由于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就认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完成，因而丧失警惕，右倾麻痹起来；另一方面也有些人看不清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缺乏清醒的头脑，不善于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再次是由于工作的胜利和旧思想的影响，在一些干部中也滋长了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放弃对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这样，也使某些人民内部矛盾尖锐化、表面化，得不到正确的解决。

特別嚴重的是，在這個革命發展的轉變關頭，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又一次充當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和赫魯曉夫的應聲蟲，極力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和“唯生產力論”，胡說什麼在三大改造之後，“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了”，“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國家最重要的任務是組織社會生活”，“國家專政的機構可以縮小了”等等。他並且玩弄陰謀伎倆，把他的修正主義黑貨塞進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妄圖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路綫強加給全黨，為國內外反動派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服務。

因此，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怎樣認識國內的政治形勢和階級關係，還有沒有矛盾、階級和階級鬥爭，還要不要無產階級專政和黨的領導，還要不要繼續革命，怎樣正確區分 and 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怎樣才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等等，就成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綫鬥爭的根本問題，必須給以馬克思主義的回答。只有正確地回答這些問題，才能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和階級鬥爭形勢保持清醒的頭腦，才能把社會主義革命繼續推向前進，才能促進社會主義建設，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就是在上述國內外形勢下，毛主席及時地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一光輝著作，深刻地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完整地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正確地回答了上面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批判了赫魯曉夫、劉少奇之流的修正主義謬論，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綱領，是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具有極其重大的理

論的和实践的意义。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的历史北景

作者 =

页数 = 1 4

S S 号 = 1 1 2 2 2 8 6 0

出版日期 = 1 9 7 5 年 0 8 月